

飄揚的景觀： 康巴藏區經幡考察

● 周永明

一 多姿多彩的藏區經幡

近年來，在中國西南地區從事我稱為「路學」的研究，經常行走在川滇的康巴藏族地區（以下簡稱「康區」）。從日常所處的都市校園走進藏區，每次田野調查都像享受一場視覺感官的盛宴。藏區的天空湛藍高潔，一塵不染；白雲映照下的草甸平緩寬闊，綠浪連綿。藍天綠野的盡頭時常可見高聳入雲的雪山，雄奇偉岸。壯美的自然景觀讓人心曠神怡，流連忘返。然而最吸引我的，卻是那融自然和人文景觀於一體，在康區到處飄揚的五顏六色的經幡。起初，我對經幡僅僅是單純的好奇，慢慢地開始有意識地進行觀察，進而發展到試圖摸清近來它在藏區的演變，不知不覺中，探究經幡景觀已成為「路學」研究的一部分。

相信到過藏區的人，很少沒有見過經幡。「經幡」又被稱為瑪尼旗、祈願幡、風馬旗或祭馬，藏文為「隆達」。藏區的村頭、山口、河邊、湖畔、廟前、屋頂、樹幹、瑪尼堆上，

處處可見經幡。在藍天白雲、紅牆金頂，山坡草地、雪山河谷的映襯下，迎風飄揚的經幡，如張張攝影圖片，定格在我的腦海。經幡的質料有布、紗、綢面或紙質，上面通常印有經文和龍、虎、鷹、獅、馬等瑞獸圖形，有方形、長方形、三角形等多種形狀，或串在一起懸掛，或做成旗幟插放，或撐開如傘塔，或單立為柱子。我還曾見到一片山坡直接被經幡覆蓋的景象，但不常見。

經幡的起源說法不一。根據經幡收集愛好者馬軍在《西藏風馬旗藝術》中的歸納總結，其最早源於古代藏族萬物有靈的觀念，用以祭祀眾神和亡靈。佛教傳入西藏後，和原有的苯教相容，隨風而動的經幡被視為永恆的誦經，被信徒奉為增加修行、祈福禳災的捷徑。當代藏區經幡的形式和內容，同時受到了從內地傳入的印刷術以及漢文化陰陽五行觀念的影響^①。印製經幡的雕版主要存於藏區幾個著名的印經院，製作過程伴隨着一整套誦經、祈禱、喂桑（熏香）儀式，以確保過程一切順利，成品精美耐用。

馬軍在書中也引述藏族學者根敦瓊培的說法，認為經幡源於吐蕃時代的習俗。當時的軍戶常常在門前立根長矛，作為身份的榮耀符號^②。這讓我想起十餘年前第一次見到經幡的情景，那是在滇西北的迪慶藏族自治州。除了神山湖畔和出行路口飄揚的各色經幡，我發現在藏族村落的房屋上也插有經幡，只是有的多，有的少，只有少數人家屋頂正中和兩側都插有高高飄揚的經幡。當地藏族朋友告訴我，這種插法表示這家人家曾經出過活佛。為眾生祈福的經幡變成家族榮譽的象徵，似乎從另一個側面印證了經幡演化也可能和社會關係相關。

坦白地說，引起我對藏區經幡好奇心的，既不是它神秘的起源，也不是其製作的精美，更不是它別致的排列方式。讓我感到驚訝的，是它讓人震撼的巨大數量。過去的幾年間，每次去藏區調查，我都會驚訝於經幡數量驚人的增長。特別是在川藏公路沿線，不時會看到路邊的山坡上插滿了經幡旗幟，排列成幾何圖狀，成百上千，蔚為壯觀。經幡為甚麼出現在某地？是甚麼人所為？出於甚麼目的？採用甚麼方式？經幡的大規模排列源於何時？和政府或市場行為有沒有關聯？我想通過實地考察和訪談得到答案。事實證明，問題比我預想的要複雜得多。歷時幾年，經過多次專門調查後，迄今仍然不敢確定自己已經找到以上問題的答案。本文只是一個階段性的初步總結。在下文中，我先講述經幡在三處地方的不同緣起、形式和含義，在文章結尾再對自己在調查過程中的感悟做一簡單討論。

二 神山與經幡

我第一次體驗到藏區經幡的壯觀和震撼，是在著名的薩迦派寺廟塔公寺旁。塔公寺位於康定西北110公里處，據《康定縣志》記載，唐代的文成公主進藏時，曾於此地留下覺巫「彌作松覺」（釋迦牟尼像），具有鎮山鎮國的威力^③。民間更是相信塔公寺覺巫和拉薩大昭寺的釋迦牟尼像一體二身，所以在塔公寺朝佛和千里迢迢去拉薩，具有等同的功德和效果，因而塔公寺名聞遐邇，前來朝拜者絡繹不絕。這幾年塔公寺廟修葺得愈發金碧輝煌，加上它位於川藏南線轉接川藏北線的必經之地，而附近的塔公草原近年來被打造成了一個旅遊熱點，遊客、生意人接踵而來，更是讓塔公寺顯得香火旺盛。

塔公寺傍山而建，讓人吃驚的是寺後的山坡上，插滿了成百上千面高達數米的經幡旗幟，組成四個三角形經幡群後，再整體拼成塔狀，經幡群間的山上還鑲嵌了巨大醒目的六字真言。我驚詫於其規模之宏大，所需費用之不菲，覺得不可能是個人行為。如果是民眾的集體行為，那又是由何人帶領？想起人類學家黃樹民描寫東南農村在文革後修建寺廟，往往由信徒中的積極份子帶頭策劃、募捐和張羅，在此過程中還時常和政府維持緊張關係^④，那麼，塔公民眾大規模插放經幡，和當地政府有沒有互動？會不會碰到在內地發生過的類似問題？

帶着這些疑問，2013年夏天，我專門訪問了塔公鄉的鄉長和書記。鄉領導在聽明白了我的問題後，首先

斬釘截鐵地告訴我，插放經幡一事和地方政府沒有任何關係，完全是當地老百姓的自發行為。據他們所言，修建宗教建築，諸如寺廟經塔等，都有嚴格規定，須經宗教局、建設局等政府機構批准方可。而對於插放經幡，鄉政府沒有干涉，原因是塔公寺後面的山是當地幾個村信奉的神山，在神山上插放經幡、祈求平安是世代相傳的習俗，政府沒有理由干涉。至於為甚麼規模如此之大，鄉長承認，一方面它和藏民近年來收入增加、經濟承受力提高有關，另一方面也和經幡的插放過程有關。一年中除了開山日全村家家戶戶都去插經幡外，人們也會在其他節日或祈願場合陸續不斷地插放經幡。因而數量愈來愈多，規模愈來愈大。

至於有沒有村民帶頭組織，他們的回答是，因為藏區是全民信教，所以不需要動員，家家戶戶都會參與。而且藏族和漢人不同，不以捐獻數量衡量功德高低。每人只要誠心盡力，插一面經幡和一百面在大家眼裏是一樣的。他的一席話讓我意識到自己的思考角度和當地人的差距。當我指出由於當前神山上壯觀的經幡事實上已經成為一個新的景觀，政府有沒有考慮將其納入塔公景區規劃時，他們再次重申，神山上的壯觀經幡和發展旅遊沒有直接關係，政府從來沒有主動規劃過此事，但對目前的狀況也沒有意見，覺得有益無害，樂觀其成。他們的這番表態，一年後我從甘孜州的一位退休官員處也得到了證實。用這位前官員的話說，政府覺得經幡景觀對發展旅遊有益處，所以對經幡大規模的擴張，一直持寬容態度。

經過多方訪談，塔公神山經幡這幾十年的歷史脈絡慢慢變得清晰起來。寺廟後面的山歷來是當地村民信奉的神山，世代祭拜。即使在文革時期政府採取高壓宗教政策，但受影響最大的是寺廟，在老百姓心中，神山信仰依舊，村民仍會自發到山上插經幡，只不過當時財力物力有限，經幡數量不多而已。近年來隨着宗教政策的相對寬鬆和當地經濟發展加快，人們用經幡祭拜神山的規模和數量才出現了令人吃驚的增長。但沒有變的，是當地人對神山的敬畏，對宗教的虔誠，對平安生活的渴求。

三 聖迹與經幡

阿壩州紅原縣瓦切鄉，現在擁有號稱四川藏區最大的經幡園和經塔林，方圓有二百畝之廣。得知我想了解經幡在藏區的變化，長期研究康區的同行彭文斌建議我一定得去瓦切看看。2014年夏天來到瓦切，又經歷了一次視覺震撼。和塔公不同，瓦切的經幡分布在一片空闊的平地上，而且主要是高大的經幡傘塔。傘塔中間的立柱有的高達十餘米，以柱為圓心，從頂端拉下數十根繩索在地上圍成一圈，懸掛在繩上的藍、白、紅、綠、黃五色經幡鋪展開來，形成一個個最大可達百米見方的巨型傘塔。碧野藍天，經塔的白色金頂和五彩經幡相互映襯，風吹幡搖，經幡的飄盪聲和經塔的風鈴聲合二為一。佛音繚繞，氣象莊嚴，令人心正神清。

「三十年前，這裏甚麼都沒有，就是一片草地」，當地的藏族嚮導告



作者在阿壩州紅原縣考察經幡（梁文靜攝）

訴我。他說：「因為十世班禪大師來過這裏布法，後來大家就來此搭建經幡傘塔，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如今康區最大的經幡園。」查《紅原縣志》，裏面只是簡單地提到1982年10月下旬十世班禪到紅原視察^⑤。據彭文斌補充，當年班禪大師在紅原要給藏民摩頂賜福，成千上萬信徒聞訊從四面八方趕來。由於縣城中找不到足夠大的地方，所以選了瓦切這一片開闊平坦的草地搭建了法台，供班禪大師行摩頂禮之用。從此以後，特別是班禪大師圓寂後，瓦切吸引了愈來愈多的人前來朝聖。朝聖者不僅搭建經幡傘塔，還陸續修建了許多功德塔林。短短三十年間，形成了康區草地上一個重要的聖迹。借用人本主義地理學家段義孚的話來說，正是因為人們主體經驗賦予的特殊意義和價值，瓦切才由一個純粹的「空間」(space)變成一個充滿意義的「地方」(place)^⑥。

為甚麼塔公的經幡以旗幟為主，而瓦切卻是滿眼的傘塔？從訪談中得知，經幡形狀的選用和藏傳佛教的不同教派有關。寧瑪派（紅教）以傘塔為主，格魯派（黃教）、苯教則多取旗狀。當然還有其他的解釋，比如從地形角度着眼，認為紅原等牧區山坡平緩，適合於經幡傘塔集中擺放；而康定山勢較高，更適合插放迎風飄揚的經幡旗幟。還有人從當地農區和牧區文化經濟的差異來解釋，認為牧區藏民生活純樸，信教極為虔誠，特別樂意給寺廟和佛事捐獻；加上現在牦牛價格不菲，一頭就值好幾千元，牧區藏民搭建大型經幡傘塔的能力和意願都非常強。即使一個巨大的經幡傘塔動輒要花費好幾萬甚至上十萬，但前來朝聖祈福修塔的藏民依然絡繹不絕。

「藏區的活佛不缺錢」，看到我對修建傘塔耗費如此之大面露驚訝之色，嚮導指着正在修建的一座巨大塔

林說，「總共兩千萬，都是本地活佛的供養者捐的，都是內地的大老闆。」他的這番話點出了我近年來在藏區觀察到的一個現象，就是愈來愈多的活佛被內地信徒「供養」，而這些供養者的捐獻使得一些活佛所在的寺廟能夠大興土木，香火興旺。問及如何看待內地供養人，瓦切的藏民再一次強調只要虔誠，捐一幅幾元錢的經幡和十萬元的傘塔乃至兩千萬的塔林所積功德是一樣的。在藏區，我不止一次聽到當地人指出，同樣是祈福許願，藏民和漢人有一個大的區別：藏民的願是來世的願，長遠的願；漢人的願則常是現世的願，急功近利的願。對將幸福寄託於來世的藏族信徒來說，現世的錢財積聚，在生活中並不佔有那麼重要的意義。

瓦切嚮導的話再一次提醒了我，在信仰面前，人們對金錢含義的理解也許迥然不同。老實說，我對在塔公得到的插經幡單純出於信仰和發展旅遊與政府行為無關的解釋，一直將信將疑。以瓦切為例，原本自然形成的經幡和塔林已經被當地有關部門圈起來，設了門卡賣票收費。面對日益擴大的經幡園和塔林，我問當地人是否有朝一日，此地會形成一個新的寺廟。我得到的回答都很謹慎，認為至少近期內不會發生。不過瓦切嚮導告訴我，前不久紅原縣政府有關部門前來考察，計劃進一步統籌規劃，引進資金，將瓦切打造成一個景點，以改變紅原景點較少的現狀。嚮導指着正在修建的停車場笑說：「你們下次來，條件會好些，當然門票價格也會高些。」

我無意在此做過度解讀，但縱觀短短三十年間瓦切經幡的發展過

程，在虔誠的信徒膜拜班禪大師摩頂聖迹的純真信仰背後，隱約可見活佛供養者甚至政府等其他角色的影子，以及權力、金錢和其他世俗追求的印記。針對大師聖迹，各個群體以不同的方式加以利用，或膜拜，或祈願，或打造景點，或供養活佛。在當今市場經濟浪潮下，即使是看上去遠離塵囂的瓦切，也不可能以一方淨土而自保。當地藏民對此也不是沒有認識，記得在回答我提出的捐獻經幡傘塔會不會發生互相攀比現象時，當地人一方面嘲笑我的思路，強調和漢人動輒甩出一二十萬來爭燒新年頭香相比，藏族信徒對經幡不計大小，心誠則靈；但另一方面也承認，攀比現象也許在寺廟之間存在，不然教派之間、寺廟之間歷史上也不會發生過那麼多的爭鬥。在旅遊和供養的雙重影響下，瓦切經幡今後如何演變，值得研究者繼續跟蹤關注。

四 招魂與經幡

相比康定塔公和紅原瓦切，我在阿壩州府馬爾康城外鄧加村見到的經幡，無關神山和聖迹，只是藏民日常生活的組成部分。2014年夏，我應邀去藏族朋友紅音家作客。小村坐落於梭磨河畔，離縣城十餘里。進村前，看見河面上密密麻麻掛滿了經幡，迎風飛舞，非常壯觀。甫一進門，我就問了女主人一大堆有關經幡的問題。紅音似乎對經幡的具體詳情並不了解，於是她喊來了父親和幾個朋友來解答我的問題。

紅音的父親七十餘歲，在當地生活了幾十年。據老人說，當地常見的

經幡可以分為兩類，一類經幡是我在河邊見到的招魂幡。前不久相鄰的英波洛村有一家剛辦了喪事，在河上新掛了許多經幡。據說河上掛經幡和以往流行水葬有關。掛在河上不僅集中，而且風吹經幡是唸經，隨波漂流也是唸經。加之藏區風俗，褪色破損的經幡不能銷毀，要隨其自然分解，而經幡掉落水中被視為一種潔淨的消解方式。現在水葬基本上沒有了，但還保留了人死後在河上掛經幡招魂的習慣。

按照老人的說法，現在有錢人行天葬，一般人家土葬愈來愈多，經幡常常掛在墳地旁邊。每個村有各自的墳地，約定俗成。去年老人的老伴去世，親朋好友送來的喪禮，除了錢幣和酥油外，還有許多經幡。按當地習俗，別人送的經幡都得掛出去，所以紅音母親的墓地旁邊也掛了許多經幡。至於該村經幡的數量，老人回憶道，他小時候經幡很少，三十張已經很多了，不過當時是用純粹的白布製作。現在村民富了，經幡掛得愈來愈多。不過和瓦切那樣的牧區相比，鄧加村所在的地方經幡數量還不算特別多。牧區沒有墳墓，都是天葬，加上有壩子(平地)，所以喜歡搭建經幡傘塔。雖然老人也同意牧民信教更為虔誠、捐獻更多的說法，但又特別指出，鄧加村沒有搭建連片經幡傘塔是由於沒有客觀條件(平地)。

當地另一類經幡是用來祭拜每個村子的神山。祭拜神山的經幡內容和招魂幡不一樣，主要是為了祈求平安。常常是插旗杆和撒「隆達」(風馬紙旗)。開山時每家每戶都參加，根據能力，能插多少插多少，功德是

一樣的。當我問到商業化浪潮和政府行為對經幡習俗有沒有影響時，老人略加思考後回答：現在許多事情都在變。有錢的話，你可以僱人來搭建瓦切那樣的大型經幡傘塔。加上近年來政府禁止伐木，所以大規模插經幡要提交砍樹申請，比如說需要三十棵。但老人語帶幽默地加了一句，手續批下來後實際上砍多少棵就說不清了。在場的人對這一永恆的民眾和政府博弈故事發出會心的笑聲。

作客紅音家，經幡隨處觸目可見。屋頂房檐上是飄動的經幡，院子後面的山上是一簇一簇的經幡，房子邊的梭磨河上也掛滿了經幡。經幡和村民日常生活密切相關，和生活環境融為一體。這裏的經幡雖然沒有塔公神山的壯觀，沒有瓦切草地的神聖，但我置身其中，心中感動莫名。感謝主人的好客，感謝老人回答了自己許多未解的問題。同時覺得，自己幾年來跟蹤觀察藏區經幡變化，是向這個純真善良智慧民族表示敬意的一種最好的方式。

五 縱深討論

幾年來，我訪問了許多藏區學者、官員和一般民眾，大家一致同意的是：第一，康區出現大規模的經幡景觀是最近的事情。西南民族大學的郭建勛認為經幡景觀只有短短十多年的歷史，最早見於雲南藏區。根據近幾年的觀察，四川藏區更為多見。第二，無論是插經幡還是搭傘塔，基本上是藏民基於宗教信仰的自發自願行為。這種行為具有悠久歷史，近年

來，隨着藏區經濟物質條件的改善，使得播放經幡規模愈來愈大。第三，政府行為和商業因素在這一過程中迄今似乎還沒有積極主動介入，但如我們在瓦切見到的，內地活佛供養者的角色和當地政府建設旅遊景點的規劃，會不會對藏區經幡景觀產生大的影響，還有待進一步觀察。

剛開始考察經幡時，我覺得應該是個比較簡單的課題，沒有料到幾年過後，要說已弄清楚其來龍去脈，我仍然沒有把握。起初，當地人對我提出的問題，諸如插經幡由何人帶領、需要多少費用、經費來源、政府有沒有參與等，常常顯得茫無頭緒，無法回答。我也時常有挫折和失落感，覺得當地人對此事關注不夠。後來才漸漸明白也許是當地人對我提問的角度，頗感陌生。作為一個外來研究者，被壯觀的經幡景象震驚後，自己首先想到的是經幡規模的增大、數量的增多、所需費用和勞力的增加，以及這些問題如何解決？和當地政府發展旅遊的努力有沒有關係？而當地人出於信仰習俗播放經幡，自覺自願，各盡所能，大小多少不限，花錢多少不計，和政府更是沒有關係。當地人大多沒有想過我的問題，難怪難以給我簡單明瞭的回答。

可以這樣說，我和當地人擁有的是兩套不同的文化語言系統，對同一問題的解釋關注點不同。要達到交流順暢，需要各自對對方的文化語言有所了解。在藏區牧場呆過十幾年的文化研究者賀先棗給我講過一個發生在1970年代的故事。當時物資供應緊張，買布還需用布票。牧民穿皮衣，他們拿餘下的布票去買白布，

用來印製經幡。有漢族的小學教師，晚上偷偷地跑上山扯下經幡回來做布袋。這個教師認為掛經幡是浪費，他是廢物利用。將藏族神聖的祈福象徵物視為無價值的「廢物」，這可以算作不同文化語言系統之間交流隔閡的極端例證。我的思路是，研究者逐漸了解「當地人的視角」(native's point of view)固然可喜，當有意識地用自己的文化語言提問時，是不是也能對當地人了解外來研究者的文化語言有所促進呢？

抱着這種想法，我堅持不斷提及藏區經幡景觀可能不可避免地要和政府和商業因素，也就是「權」和「錢」發生關係。因為我認為在當前商業化大潮之下，即使偏僻的藏區也難以倖免。讓當地人在回答我的問題時思考經幡將來可能面對的情況，希望他們也了解我使用的文化語言；我從他們的文化語言中看到了經幡連接的虔誠、禮拜和淡泊，哪怕當地人從我的文化語言中看到經幡可能面對的貪欲、消費和危險，是不是也增加了我關注經幡的意義？人類學者拉比諾(Paul Rabinow)回顧他在摩洛哥的田野工作，意識到他的訪談對象在回答問題時，首先會對當地文化進行分析重構，然後再向人類學者講述，從而積極參與了對問題解釋框架的構建。拉比諾認為，田野調查成功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能不能找到有良好表述能力的訪談者以及人類學者對他的「培訓」⑦。在此，我想拋棄歐美人類學者莫名的優越感，將自己擺在和當地訪談者平等的位置。我們彼此在問答中學習了解各自文化語言中對經幡的理解和解读，希望能幫助彼此

充分準備，來應對經幡可能會遭遇的變數，甚或滅頂之災。

事實上，權力、金錢和消費欲望，很可能以比我們想像要快得多的速度，改變和衝擊藏民插放經幡的本意。信仰在面對權力和金錢時，可以快速轉身。一位當地人告訴我，如果由政府來出面規劃經幡，那麼經幡馬上就能和信仰脫鉤，變成「錢」的問題。當地人的態度會很簡單，「你出錢我才插」。隨着愈來愈多內地旅遊者和活佛供養者進入藏區，經幡在商業化和金錢面前會走向何處？經幡會不會經歷「宗教文化的旅遊資源化」^⑧？經幡會不會像藏區公路一樣成為旅遊者的「消費」對象^⑨？我希望通過自己提出的問題，能讓當地人從我這個「外地人」看待經幡的角度中見微知著，聞訊而警。

我在調查經幡時遇到的困難，另一方面也說明了現有研究對它的重視遠遠不夠。藏區宗教和文化關聯緊密，宗教景觀和日常景觀不可分割。然而，當下眾多對藏區景觀的研究和報導，常對具象、宏大、永久性的宗教景觀濃筆重彩，諸如宏偉巍峨的寺廟、靜穆莊嚴的神山等等，對存在於日常生活中、不那麼引人注目的景觀很少加以關注。在此我想引用美國景觀地理學家傑克遜(John B. Jackson)的「鄉土景觀」(vernacular landscape)概念^⑩，提醒人們關注藏區那些類似經幡這樣流動、隨意、不斷變化和反覆出現的景觀。這些景觀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正因為其流動性，所以它們也可以在短時間內變化劇烈，從不為人所知，變成吸引人們眼球的現象。經幡這十幾年間

在康區的變化，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傑克遜強調景觀研究要「見以致學」(to learn by seeing)^⑪。從這個角度而言，我的經幡調查之旅才剛剛起步，值得持續不斷地跟蹤下去。

註釋

①② 參見馬軍、黃莉編著：《西藏風馬旗藝術》(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2008)，頁5-6；5。

③ 參見康定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纂：《康定縣志》(成都：巴蜀書社，2000)，頁382。

④ Huang Shu-min, *The Spiral Road: Change in a Chinese Village through the Eyes of a Communist Party Leader*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9).

⑤ 參見四川省紅原縣志編纂委員會編纂：《紅原縣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頁39。

⑥ Yi-Fu Tuan,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7).

⑦ Paul Rabinow, *Reflections on Fieldwork in Morocco*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⑧ 四川旅遊學院向玉成老師和筆者討論經幡時的用語，2014年6月。

⑨ 參見周永明：〈漢藏公路的「路學」研究：道路空間的生產、使用、建構與消費〉，《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15年4月號，頁18-30。

⑩ John B. Jackson, *Discovering the Vernacular Landscap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⑪ John B. Jackson, preface to *Discovering the Vernacular Landscape*, xxi.

周永明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人類學系教授